

调资时的“四不”表态

1969年3月,我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沈阳黎明机械厂39车间当车工,工资定为二级。学徒期间,师傅耐心教,自己认真学,不到两年时间,我就掌握了本行业的车工技术,并能独立操作,超额优质完成生产任务。

转眼到了1972年,总厂下发文件,要给技术“拔尖”的职工涨工资。自“文革”以来,相隔六七年后才调工资,许多职工都眼巴巴地盯着有限的名额。我拿着调资细则对照,觉得自

己符合调资条件,工作表现也不错,加之家庭收入低,经济状况拮据,如果能调上,可以缓解家庭生活困境。

车间领导为做好这次调资工作,决定采取考核办法,优中选优。同时还在车间大会上讲:“这次调资结束,就是下次开始。”告诫大家要正确对待。

我想:自己虽有较好的调资条件,但也要正确对待。于是,我在班组会上表态:“如果调不上,一不泡、二不闹、三不找、四不

告。”车间党支部书记李启发抓住我这个典型,在车间大会上公布了我的“四不”表态,工厂编印的《黎明报》也刊登了这条消息。

几天后,车间又召开职工大会,李书记说:“孙连杰的‘四不’表态,在车间影响很大,多数职工都能正确对待。昨天晚上,调度室的李文启同志来我家,我以为他是要‘名额’呢,可他说,在这次调资中,车间领导逐个找职工谈话,太忙太累。他

表示,领导不用找他谈了,调不上正确对待,也做到‘四不’。”车间里的党员除了自己正确对待调资外,还积极做群众工作,使39车间的调资工作平稳进行,没有一个上告的,调上的大伙服气,没调上的照样好好工作,车间里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。

虽然那次没给我调资,但看到车间形势稳定,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

孙连杰/文

粮票成了我的“救兵”

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,粮票是一种购粮凭证。虽然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对我来说,却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我开始使用粮票是在1982年,当时我在我们乡中学读书。记得那时集市上的缸炉烧饼是1毛钱一个,如果用粮票,是2市两粮票,只掏6分钱就行。父亲当时在外上班,吃着“公家饭”,每月的粮票省着用能给我留点儿。少掏4分钱就能吃上一个烧饼,同学们都很羡慕我。

1983年,父亲因为拿到了专业技术职称,按照政策,可以为家人办理非农业户口,我因此沾了父亲的光。从上初二开始,我也吃上了商品粮,每月也开始领粮票了。

后来,我到省会石家庄上中专,虽然只有两年时间,但粮票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出了大力,帮了大忙。

我上学时,父亲每月才有100多块钱的工资。因为学校每月补贴我37块钱伙食费,所以,父亲每月再给我40元钱,就能让我吃饱饭。可由于虚荣心做祟,见同学们都有皮鞋和西服,我也鬼使神差地到街边摊买了一件灰色西服。刚穿上看着挺风光,但洗了一次就变形了。当时我喜欢读书,经常到书店买一些诗集、散文、小说等,这样一来,父亲给我的40元就不够花了。毕业那年,正好有高年级学生来宿舍收粮票,我把平时攒下的全国、地方粮票换成钱,这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孙建敏/文

难忘擦鞋大姐的鼓励

我大学毕业那年,恰逢国有企业处于艰难脱困、民营企业还发育不全的时期,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。

毕业后,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蜗居,开始求职。那时,求职很不方便。白天,我沿街到一家家公司敲门自荐,很晚了,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,常常一天只靠3个馒头充饥。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,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中秋节那天,我一连去了3家公司应聘,都惨遭失败,我的自信心降到了冰点。平日滴酒不沾的我,破例在一家小酒馆喝了大半瓶白酒。踉踉跄跄地出来后,正好不远处有一个擦鞋摊,我走过去坐下,想趁擦鞋的工夫休息一会儿。

擦鞋的大姐看起来有40多

岁,她一边麻利地擦着鞋,一边与我交谈。闲聊中得知,她来自偏远农村,丈夫几年前不幸病逝,留下7亩地和两个上学的孩子。为了生活,她咬紧牙关,耕田种地,农闲时,就到城里来擦鞋,给儿子攒学费。

几分钟后,我的鞋已擦得锃亮。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失意和无奈,在我起身要走时,她特别说了一句:“想开点儿,兄弟,没有跨不过的坎儿,走好啊!”

擦鞋大姐的话让我心头一热,酒一下子醒了。她积极打拼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。接下来,我继续毫不气馁地找工作,不久就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。仲秋时节,我不禁又想起那年的中秋,想起那位给我鼓励的擦鞋大姐。明伟方/文

朝花夕拾

铁锅烩白薯

上世纪50年代初,我生长在唐山玉田县农村。大田地除了种植高粱、玉米、大豆、小麦外,还在边沿沙土地块种白薯。

秋天,农户将白薯运回家,大多切片晾干碾粉,有一少部分烩着吃。要把白薯烩出“油”,甜腻可口,还有不少学问呢。我母亲烩白薯就有一套招法。

母亲把白薯洗净,在大铁锅的底部码放三层呈网状状的白薯,上面有序地摆放短粗、表皮略白的白薯,足有15公斤。锅里的水没过白薯即可。盖好盖,锅边塞抹布防漏气。用木柴硬火烧开锅,听到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后,再用茅草微火烧20分钟,再焖一会儿,揭锅一看,白薯错落有致地“躺”在锅里。母亲手蘸凉水拿出,放在盖帘上。锅底烩出黏黏的暗红色的“糖油”,用手指一蘸,放到嘴里甜甜的,网状的缝隙溢满了“糖稀”,晾干切块,含在嘴里,可与糖块相媲美。此时我才明白,母亲为何把底层的白薯摆成网状。

一家烩白薯多家送,互品不同地段的白薯。送白薯是小孩的差事,我跑完李家跑赵家,真是开心极了。

连捷/文

图说
我们的
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勤
善



巴邑张雪文作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忘年好搭档



上世纪80年代末,不到30岁的刘玉珂老师调到我们的山东省庆云县东郎坞中学任校长,而作为教导主任的我已经50多岁了。因校舍紧张,我和刘校长共用一间房,既当办公室又当宿舍。刘校长在生活上对我体贴照顾,工作上抢在前头。除了做好领导工作外,他还任教一个班级的语文课。我们二人配合默契,把学校工作抓得有声有色,教学成绩连年在全县名列前茅。因工作需要,1994年,他被调入高一级的学校。图为我们二人当时的合影,左为本文作者。郑天峰/文并供图

儿时拾白薯

白露节气刨白薯。小时候,到了刨白薯的季节,我就和伙伴们去拾白薯。

清晨起来,我顾不上吃饭,就背着一个棉花兜子,扛着一把铁锹,约上同伴一起出发。找到刨过的白薯地,首先找刚刚钻出地皮的白薯芽子。因为有白薯芽子的地一定有白薯,用锹一挖,果不其然。那是主人丢在地里的白薯生了芽,拱出了地皮。白薯芽子找不到了,就用铁锹挖,一锹挨一锹,不一会儿,就会从锹下滚出一块白薯。有时挖出一块大点儿的,就高兴地大叫一声:“哈哈,我发财啦!”伙伴们就会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我们从早拾到晚,累得腰酸腿疼,肚子饿得咕咕叫,也舍不得吃一块白薯,都留着回家向父母报喜。

有一回,我们发现一块白薯地丢的白薯特别多。用锹一挖,能挖出好几块来。为了不耽误时间,我们把挖出的白薯扔在一块儿堆着,等从这头挖到那头,再回头把白薯敛起来。等

挖到地那头儿,已堆了好几堆。我们正想敛堆下的白薯,回头一看,天呐,不知谁家的两头猪“咯吱、咯吱”吃得正香。它们吃完这堆儿吃那堆儿,我撿下的白薯堆儿被它们吃个精光。我一怒之下朝两头大母猪跑去,向每头猪踹了两脚,它俩哼了几声,扭着屁股扬长而去。

如今收白薯,机器在前边走,人在后面捡就行了,拾白薯的人也不多了。偶尔有几个老人拾白薯,那都是城里的退休职工,他们鸡鸭鱼肉吃腻了,拾几块白薯回去尝尝鲜。谷景峰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